

什麼是面子？年輕人的面子與自我價值後效之相互機制

顏姿吟¹、連廷嘉²、鄭曉楓³

本研究的目的乃探討年輕人面子的形成經驗與內涵，以及面子與自我價值後效的相互機制，以解鎖面子之於自己和人際互動的深層意義。採敘事研究，依便利取樣邀請四位年齡 25 ~ 27 歲之大專校院畢業之參與者進行深度訪談。每位參與者共受訪 2 次，共獲得 8 份文本資料，依「類別一內容」進行分析。研究結果有二，首先年輕人面子的形成有四個階段：（1）面子醞釀期：面子具代間傳遞與加成效果；（2）面子建立期：面子是演繹他人眼中美好的自己；（3）面子維護期：從「爭取面子」轉移到「不失面子」；以及（4）面子重建期：面子又聚焦回社會比較的結果。第二，面子與自我價值後效的相互機制有三個面向：（1）面子是在陌生環境中比較出來的自我價值；（2）面子的標準開始鬆動並對自我價值後效的影響降低；（3）拋下面子而從內在期望強化自我價值後效。依研究結果提出相關討論與建議。

關鍵詞：自我價值後效、面子、敘事研究

¹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

²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通訊作者：鄭曉楓，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cindy6510@ntnu.edu.tw。
本研究感謝匿名審稿委員提供寶貴意見，深助益於本文品質的提升，謹此誌謝。

「怕沒面子」、「怎麼樣都不能失面子」……似乎是年輕人經常掛嘴邊的用語。但什麼是面子（face）呢？面子是人際中常見的一種現象，意涵著人與人互動中有關個人形象與地位的評價，面子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包含情境、個別差異、文化與性別等（Tracy, 1990）。

（一）面子的定義與特色

以文化的角度來看面子，華人社會偏重整體與關係，所談論的面子含「他人取向」與「情境脈絡」之特性。根據黃光國（1988），人處於親密社會與文化（intimate society and culture），父母、親友等「情感性關係」之重要他人自然會被考量於個人的面子當中，也就是個人會因為在乎家人，而努力爭取共同的「體面」。以學業表現來說，當個人了解到成績代表勝負高下的競爭結果，就會爭取好成績以得到面子（蘇珊筠、黃光國，2003）。即便偏鄉青少年，也期待能完成高中職學業或穩定就學，讓自己與家人有面子（林淑君、王麗婁，2017）。到了大學，家人仍期待自己孩子就讀他人眼中高評價的大專校院或科系，或者孩子期待自己所就讀的大專校院科系是被他人肯定等（王彥舜、許雅茹，2016）。此說明了個人會為了自己和家人受肯定而去爭取面子，而此處的面子代表的就是自己與家人的共同面子。逐漸地，當人們進入運作性的社會與文化（operative society and culture）當中，除了互動的對象是能帶來價值或彼此協助達成目標之「工具性關係」外人，例如學校的師長、同學等，在乎的就是對方能否為自己帶來好處，進而「顧全」或「贈予」彼此面子，面子意味著成就或道德素養表現而獲得的社會地位或聲望（黃光國，1988）。可見，華人社會所談的面子偏他人或情境取向，可區分是為了自己與親友爭取之共同「體面」，以及相互給予之顧全性面子。

相對強調個人主義的西方社會，Goffman（1959）認為面子是外在自我形象的維持，也就是他人眼中的自我，以及以自我形象為主的社會互動過程。而沒面子或丟面子，則是一種羞愧、難堪的狀態（Goffman, 1956）。White 等人（2004）指出，面子威脅敏感高者，容易在互動中感受到威脅而產生負面情感。當有衝突情境時，為了維持可信任的形象，會主張與表達自己的想法、情緒等，甚至適時反擊（Oetzel et al., 2001），以維護面子和尊嚴。面子隨著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觀點，Ting-Toomey（2005）更周延地將面子分為三種，第一為自我面子（self-face）：指顧及自己的形象要超越他人的形象，第二為他人面子（other-face）：指顧及其他人的形象，第三為相互面子（mutual-face）：指同時關注雙方的形象和關係。在此不難看出面子包括了爭取自己的面子、維護他人的面子、以及互動彼此給予的面子。西方個人主義提及的面子多傾向自我取向，當面子受到威脅時會做出某些行為予以表達，也會極力維護自己的形象。由上可知，不同的文化對面子有不同的定義，華人社會對面子的定義著重他人或情境，西方個人主義對面子的定義多聚焦於自我的觀點。

以互動的觀點來看，Hwang 等人（2003）表示，面子是透過和他人的互動來肯定自我形象。期以個人表現獲得社交中的權力和位置之評斷標準，會形成積極性（positive）面子與消極性（negative）面子（Brown & Levinson, 1987）。積極性面子是希望得到他人的讚賞、喜愛及尊敬；消極性面子，是期待擁有自身的行動與自主決定，不受到干涉或阻礙。然而，大部分的學者會把面子與社會互動加以連結，例如許詩淇與葉光輝（2019）提及，個人會重視社會群體之間的交往，在互動中彼此擁有面子和保護面子。早在過去，King 與 Myers（1977）就已將面子分為社會性與道德性，社會性面子（social face）指的是個人因社會成就（財富、才學等）而擁有的聲望；而道德性面子（moral face）則是指團體或社會對一個有道德聲譽者的尊敬。是以，個人社會性的成就與道德聲譽是使個人感到「有」面子的重要面向，面子參雜了個人取向與他人取向。另一方面，面子被視為人際互動的法則，隱含了社會地位、角色確認等（陳可心等人，2020）。面子也是一種心理機制，當我們感到有面子時會經驗正向情緒，陳之昭（1995）將面子定義為個體知覺到他人的重視及讚賞，能在他人心中佔重要之地位，從內心延伸出榮耀、得意及愉快之感。由此觀點，面子不外乎積極於與他人互動，在關係中努力建立個人有更好的社會聲望、評價及認同；另一方面，面子也是獲得正向情緒的心理機制。

然而，從個體的社會與心理發展來看，又是如何年輕人的影響面子呢？首先，根據 Erikson（1958, 1963）社會心理發展階段（stages of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心理會產生危機（crises）是與個體的心理需求與社會需求有所衝突。而心理社會發展之概念強調的是發展中社會性本質，並

貫穿整體生命之不同階段，具體而言，我們如何與他人互動，影響著我們如何看待自己。Erikson (1994) 認為，發展完好的自我認同是目標、價值與信念相互妥協的結果，它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意識到自我的一致性 (consistency)，以及他人對這種一致性的認可。依上，社會心理發展階段論強調個體在各個發展階段中，心理、社會層面不斷自我整合的過程；如同面子的形成，也隱含著個人如何看自己，個人如何從與他人互動中評價自己，甚至自己在社會脈絡中的定位等多面向的綜理。可見，面子的形成與個人的發展階段有關，面子的內涵無法與社會文化脫鉤。以 Vygotsky (1978) 的社會文化理論 (sociocultural theory) 來看，認知發展受到文化與社會因素的影響，社會互動對心理能力 (mental abilities) 的發展具有重要性，例如社群 (community) 在發展的意義上就扮演重要的角色。認知發展是一個社會性的調節歷程，比方說兒童透過與社會中具有知識的他者 (more knowledgeable other, MKO)，老師、父母、教練、同儕等，進行合作性對話 (collaborative dialogues)，進而建構了文化價值、信念及問題解決策略等，促使學習者在近側發展區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中之最大學習。

從青少年到社會新鮮人的階段，Marcia (1966) 認為青少年自我概念的形成本來自對意識形態和職業的探索、承諾，例如宗教、政治、職業、人際關係、性別角色等。當個體開始認同角色楷模時，即開始發展自我認同，楷模提供了個體探索「可以成為誰」的選擇。Marcia 進一步提及，自我認同的發展過程，青少年被期待作出選擇並在社會脈絡的範圍中對選擇予以承諾。Marcia (1980, 1991) 提出四種自我認同類型：第一是早閉型認同 (foreclosure)，個體早期即依從父母或重要他人的意旨來選擇未來的職業類別，未經歷認同危機而已達自我認同。第二是迷失型認同 (identity diffusion)：個體未積極探索，也不清楚未來職業目標和方向，可能經歷認同危機，但尚未達自我認同。第三是未定型認同 (moratorium)：個體開始試驗不同的職業，但尚未確認做最後的投入，正在認同危機中檢驗不同的選擇和意識形態。第四是定向型認同 (identity achievement)：個體積極探索，對自我認同、職業選擇及意識形態明確，反映其真正嚮往與熱情投入之所在。很明顯的，抱持不同的自我認同型態，對於職業定位、自我價值等都有所不同，間接影響個體所感知的面子。因為個體從青少年晚期邁向成年期時，並非只是年齡、或人口學變項的轉變，還有身處的環境與責任等的不同，所以無法簡約自我認同的歷程，而須歷經不斷探索、反覆修正與確認的過程 (楊順翔、陳坤虎, 2023)。故當我們在探討年輕人的面子，勢必也應該考量兒童、青少年等前期階段形塑過程的重要影響。面子可能與自我認同有關，也會隨著各學習階段而著重點不同。

根據從不同文化、社會互動，以及社會與心理發展等觀點來審視，我們依稀可以理解面子與諸多因素有關，但具體所言，面子是如何形成？內涵又是什麼？目前文獻仍難以完全回應此問題，我們對「面子」所知仍有限。

(二) 年輕人各階段的面子功夫與後續效應

雖然國內年輕人面臨環境的轉換與改變，從校園學生至職場新鮮人，他們是如何看待和掙得面子？Brown 與 Levinson (1987) 強調人們普遍希望「有」面子，會致力於所謂的「面子功夫 (facework)」。面子功夫就是面子的運作，是為了維護自我面子或支持他人面子的溝通策略 (Ting-Toomey, 2005)。Arundale (2010) 認為面子功夫是溝通者在人際互動關係中進行面對面交流時，為顧及自我或他人形象，而表現出強勢或緩和之行為反應。面子功夫也是個人在衝突前、衝突中及衝突後，為營造正面形象所採取的具體策略，例如據理力爭、假裝沒事等，面子功夫代表衝突互動和溝通能力強弱的程度 (Oetzel et al., 2008)。許詩淇與葉光輝 (2019) 直接了當地認為面子是影響華人際互動運行的「潛規則」。吳翠松等人 (2015) 強調，華人所談的面子會考量人際關係與團體和諧的層面。當然，個人與所屬人際團體的疏離關係，可以用來評估對於面子的影響；越緊密的關係如家人，越容易考量面子問題，越疏離的關係，對面子的影響則越小。面子的運作顯然受個人與他者之間的關係程度影響，當關係較為疏離時，似乎面子的考量也不甚重要。此論點呼應本土心理學家 Hwang (1987) 提出的「人情與面子理論模型」，當請託者 (petitioner) 請求資源支配者 (resource allocator) 協助時，資源支配者會先進行彼此之間的關係判斷，再決定協助的程度。而請託者與資源支配者之間的關係，涉及雙方之間的權力差距 (power distance) (Hofstede, 2001)，也就是 Fiske (1991) 理論中所謂的權威排序。由此可知，特別是在華人社會的集體主義下，

個體是否著力於面子功夫，也端視與該屬團體或對方的關係程度。

青少年階段的自我認同與年輕人面子的形成經驗應息息相關。國內陳坤虎等人（2005）認為自我形象與形象認同是青少年在嘗試不同社會角色的扮演過程中所形成的。其等人進一步探究臺灣青少年的自我認同內容，發現除了「形象認同」之外，也同時存在「社會認同」與「個人認同」。「社會認同」是指受環境與人際影響後，形塑出的自身受歡迎程度、印象整飾等；「個人認同」則指個體受自我經驗影響後，形塑出的自我認識、與生涯目標等心理狀態。就不同學習階段而言，大學生在「個人認同」的確定性顯著高於國、高中學生；與大學生相比，國、高中學生較重視「形象認同」與「社會認同」；國中學生對「形象認同」的重視又比高中生更高。這顯示隨著年齡增長，「形象認同」的重要程度逐漸下降、「個人認同」則愈發重要，「社會認同」的重要性在進入大學階段後稍減。從此不難看出，無論是「形象認同」、「形象認同」或「社會認同」，都含有個體自我形象、自我評價，以及他人對自己的評價，都關聯著個人所感知的面子。

從青少年到年輕時期，面子也會為自己帶來一連串的后續效應。Gorghiu 等人（2015）對 146 名 14 至 19 歲的青少年研究指出，學業表現是左右自我好感的重要面向，當個人獲得正向自我形象，自然激發投入學業的動力。本土研究侯盈如等人（2021）認為青少年在意他人評價，希望他人能稱讚自己，並希望他人給予面子與地位的象徵；當青少年感覺自己沒有面子的時候，自尊的評價也隨之降低。可見，面子除了與自我形象有關，也連帶影響自尊。個體在一連串的生活經歷後，會從人際互動經驗中檢視自身的價值，逐漸形成一種主觀性的評斷（Coopersmith, 1967）。然而，生活中總是有不同正、負向事件的衝擊，當個人主觀性的認為該事件甚為重要，其自我價值上下起伏的波動也愈大，Crocker 與 Wolfe（2001）稱此為「自我價值後效（contingent of self-worth）」。舉例來說，Lawrence 與 Smith（2017）談到若個體在學業上投入愈多心力，此自然就成為自我價值的指標。學業自我價值後效高者，會因學業的成功經驗而提升自我價值，達成該領域目標的動機也相對提高，以致願意再投入較多的時間與努力（Crocker et al., 2006）。類似於，好的開始（結果）是成功的一半，當一個人在某個領域有成就而獲得面子，自然會投入更多心力於該領域，後續掙得「更有面子」的機會也越大，反之亦然。面子的形成和考量，與個體所經歷的生活事件有關，當該事件為個人所重視，其後續效應影響也越大，關乎個人後續的投入性。

就年輕成人階段，自我價值後效受到幾項面向影響，包括社會比較、父母教養方式、學校氛圍等。以社會比較來說，當自我價值後效高時，個體更在意自己是否符合外在衡量標準，且為了追求心中的理想，會主動進行社會比較；自我價值後效低時，個體較不在意是否符合外在的標準，亦不需要經由他人檢驗或認可自己的價值，社會比較相對不具重要性（Deci et al., 1999）。故自我價值後效高的狀況，可能會因為更加投入而獲得後續的面子；但是當自我價值後效低時，可能連面子都不覺得重要，自然減少面子功夫。就父母教養方式而言，McCormick 等人（2015）指出，父母的教養方式與子女的自我價值後效相關，而個人的自我價值後效又與自我的內化攻擊呈正相關。在學校氛圍方面，蘇珊筠與黃光國（2003）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調查發現，最會讓自己感到沒有面子是來自於老師的指責；韓貴香（2014）進一步指出，被公開指責會感到沒面子，並常伴隨出現沮喪、鬱悶、困窘與難堪等情緒。近期的國外研究指出，自我價值的判斷隨著年紀有所不同，從依據自己以前的表現，到逐漸取決於要比他人更好，且這種競爭意識在高中階段更為加劇（Donohoe et al., 2021）。由此，我們隱約了解面子與自我價值後效具有緊密且連續的關係，當有面子就會產生自我價值，而高的自我價值會帶來後續更努力投入的效應，可能也會掙得更多的面子。

基於以上，東、西方不同的文化所偏重的面子定義有所不同，但也多少融合了他人取向與自我取向。面子的形成與內涵也需考量個體在社會與心理發展階段，例如青少年時期的自我認同、自我概念等皆與年輕時期的面子有關。個人為了讓自己「有」面子，會進行面子功夫溝通策略，而由生活事件累積的面子也會帶來自我價值的連續效應。但透過文獻探索，仍有許多難以釐清的理路，例如年輕人面子如何形成？面子與自我價值後效之相互關係又是如何？本研究試圖填補以上兩個缺口，邀請一般大專校院畢業之 20 歲世代，以回顧的角度來審視面子在生命過程中所呈現的樣態與意義。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乃探討年輕人面子的形成經驗與內涵，以及面子與自我價值後效的相互機制，以解鎖面子之於自己和人際互動的深層意義。

方法

(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一般年輕人為主，強調面子故事的再現。參與者回溯敘說自己生命歷程中的有關面子的重要經驗，並依此進一步剖析自己對於面子的想法，以及面子在生活中與人際之間的意涵。林美珠與溫錦真（2018）所提，敘事研究的特別之處即包含敘說者自身的觀點，也包含相關的社會脈絡。本研究採敘事研究，主要因注重參與者個別的生命經驗與觀點，希冀透過從其敘說的事件萃取有意義的心理構念，深入理解環境脈絡、人物互動、主觀感受與背後意義，藉此了解面子與自我價值後效的相互機制。簡言之，本研究以敘事研究深入理解並覺察參與者真實生命中的面子經驗，以揭露潛藏的面子樣貌與深層意義，具體採深度個別訪談，每位參與者受訪 2 次，每次約 1.5 至 2 小時，共獲得 8 份文本資料。

(二)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採便利方式取樣，透過臺南地區三所大專校院之相識輔導人員協助，邀請四位大專校院畢業之參與者，年齡介於 25 ~ 27 歲之間（表 1）。參與者為曾對「面子」議題有深刻的感受，且願意進一步探討與揭露者，包含同意錄音、協助檢核勘誤，以及後續補充資料等。研究前，邀請參與者詳細參閱相關的研究主題、目的與過程，以及參與者的權利、保密原則等研究倫理事項說明，待研究者同意並簽署研究同意書後，開始進行訪談。

表 1
參與者資料表

研究參與者	性別	受訪年齡	選擇學校科系動機	最高學歷	自評學習表現	父母職業
A	女	25 歲	對未來生涯活動有興趣、職業名稱不錯、工作穩定	大學	佳	父：技術業自營商 母：家管
B	女	25 歲	父母覺得未來生活無虞、展現孝順父母、學校聲望	專科	被當就重修到及格	父：離異 母：病房護佐
C	女	26 歲	未來生涯活動能回饋社會、職業名稱與薪資佳、父母與親友的認可	大學	佳	父：公司主管 母：助理人員
D	女	27 歲	學校聲望響亮、工作穩定	大學	及格即可	父：中學教師 母：小學教師

(三) 研究工具

1. 訪談大綱

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依敘事研究方法的觀念訪談年輕人有關於面子的故事，包括早年家庭生活、求學過程、畢業求職等重要階段。訪談採半結構形式進行，不特別設限於訪談大綱的內容，透過開放式的回應或提問，讓參與者有更大的敘說空間，自由地讓經驗再現與發聲，以捕捉重要且關鍵性的故事。訪談中，若覺察參與者對某些主題特別關切時，會主動進行探究。

本研究以大專校院學生為研究對象，一方面他們開始進入專業知識的學習，一方面也與家人、以及校園中的師長同儕等不同關係之對象互動，累積了相當且連續的面子故事，可促進對面子議題的豐厚探究。依據蘇珊筠與黃光國（2003）研究指出，大專校院學生仍認為課業表現是自己最重視、且最有面子的面向，且 Leppink 等人（2016）也指出與中學學生相同，大專校院的個體仍在學業上承受極大的壓力，本研究的訪談大綱設計因此聚焦於生活、學習與人際、生涯發展等三個面向。此外，Polkinghorne（1995）認為一篇好的敘說研究除了理解研究參與者的情緒、認知與行動之外，

也須關注其所處的環境與重要他人，故本研究納入參與者對家人、師長與同儕等細項的提問，整體訪談大綱設計如表 2。

表 2
訪談大綱

訪談向度	訪談內容
生活面向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聽到「面子」時，你想到什麼？「面子」給你的感覺？你覺得「面子」的特性？如果用一句話形容你認識的「面子」，你怎麼說？ 2. 在生活中，有沒有「面子」的感覺？什麼事情讓你有「面子」的感覺，請詳細描述一下？什麼時候開始有「面子」感覺？你如何知道自己要考慮、或關乎「面子」？
學習與人際面向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小時候你怎麼形容自己？怎麼想自己的未來？曾嘗試做些什麼？結果？ 2. 學習與人際互動過程中，有哪些開心、難過、或阻礙、挑戰的經驗？面對這些經驗的想法與感受是什麼？ 3. 從小至今，面子曾影響你跟學校師長同儕等互動嗎？請多說一些。 4. 選擇現在就讀大專校院院系的原因？當初的選擇過程是如何？考慮過其他的選擇嗎？原因？你、或家人對這決定的想法、態度、感受？當時有想過、怎麼想自己的未來？ 5. 請說說一路來在學習或人際方面，哪些事讓你產生關乎「面子」的感覺？那是什麼時候發生的？「面子」產生何種作用？當你有「面子」的感受，你做了什麼？此時的想法、態度、感受是什麼？
生涯發展面向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這些面子經驗對你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發展，有什麼影響？ 2. 最後，對以上問題有沒有其他的補充？整個訪談下來的感受如何？

2. 訪談札記

研究者在訪談後撰寫訪談札記，包含訪談過程中對訪談現場、參與者的情緒與肢體語言等觀察、感受、反思與注意事項等，並作為下一次訪談時的準備。

3. 資料轉錄編號

第一次訪談後，研究者在一週內整理訪談錄音成逐字稿，並重新檢視訪談內容，若有不足或不清楚的地方，第二次訪談中提出。參與者的語氣和表情，例如低落、停頓、音調、重音等語氣變化，在逐字稿中以（ ）內的文字描述。研究者事後再次重新聆聽錄音，在保留敘說脈絡的原則下，刪除重複的語句，並務求資料的正確性，做為分析文本。文本編號研究者以 R 為代表，參與者 A-1005 代表第一位參與者第一次訪談的第 5 段話，C-2132 代表第三位參與者在第二次訪談的第 132 段話。

4. 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敘事分析之「類別—內容」方式 (Lieblich et al., 1998)，關注參與者故事蘊含情感、思考、與意義，並依故事傳達的意義進行分割，加以定義與分類，故從原始逐字稿至綜理研究結果而形成結論，其分析步驟如下：(1) 形成替代文本，研究者與協同分析反覆閱讀參與者的初始完整逐字稿，反思其中關於面子、自我形象與價值等意義之重要片段、並以不同顏色標示，形成後續聚焦及分析之替代文本，但不刪除其他片段，使分析者能讀取學習歷程與轉折之整體印象。(2) 定義內容類別：再次反覆閱讀每份替代文本，從中將句子逐一對照與分析，採取開放的態度置身於參與者的脈絡，讓資料與理論來回對話，將內涵概念化，發展內容類別，作為貫穿的主題與觀點。(3) 歸納類別：研究者先匯集內涵一致的句子進行概念化，並區別其它不同概念的句子，發展、整理、比較與精煉類別。在不重複意義後，進行定義與命名類別。(4) 形成結論：研究團隊再次閱讀句子，將其放回參與者所敘述的經驗中，綜合分析其歸類內涵，撰寫並討論參與者的經驗與意義，並再請參與者檢核與回饋，最後得出結論。

(四) 研究信實度

為提升研究品質，本研究以 Lincoln 與 Guba (1985) 提出之可信性、可遷移性、可靠性、可確認性等四個信賴指標作為檢驗標準。在訪談前研究者詳細說明研究目的與研究倫理，以獲得研究參與者的理解、信任、並建立安全開放的氛圍。訪談時，研究者以同理的態度，傾聽參與者的故事世界，不帶入偏見進入，盡量不去詮釋參與者的談話，以使其盡情地表達。訪談後撰寫訪談手札，記錄與研究參與者的互動印象、口語與非口語等訊息、以及自己的訪談感受、覺察與省思，以為後續資料分析時之參考。研究者詳實且完整謄寫訪談逐字稿；資料分析時，本研究先邀請參與者針對訪談逐字稿與替代文本，協助檢核文本資料與其真實經驗直達「符合」以上認可。接著研究者與協同分析先各自分析並討論 A 之第一次替代文本，達初步共識；再由研究者分析所有文本，協同分析者再予以確認與檢核；最後進行跨個案統整。其中，個別資料分析完成後附送予參與者，直到檢核於符合程度為止。

結果

(一) 年輕人面子的形成經驗與內涵

1. 面子醞釀期：面子具代間傳遞與加成效果

進入國小後，參與者覺察到自己的成績好壞關乎於家人的面子。參與者以「不可以輸給別人」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因此努力考出好成績，供家人在他人面前炫耀和揚眉吐氣。很明顯地，面子是由下一代的好成績，傳遞回上一代的面子，象徵一種好表現（成績）的代間傳遞。此外，參與者接受到父母傳達「成績好一點，工作有選擇；成績不好，被工作選擇」的觀念，故面子也包含了家人觀念的期待與價值觀，若參與者能落實和依循家人的價值觀時，家人會覺得有面子。面子也是一種價值觀的代間傳遞，由上一代的價值觀傳遞到下一代。

家長會說：「你怎麼成績考輸別人？沒辦法跟別的親戚、長輩、鄰居做比較！」沒辦法去……台語講的「比拼」！他會對你施壓，然後你會開始覺得「難道我有這麼差嗎？」然後我就會很努力，然後我考了滿分，家人一開心，去跟人家炫耀，面子有了……（D-1006）

……他們（父母）就會跟別人說：「我們家小孩念○○（學校）！」就是什麼第一志願啊，那時候，都會這樣講。（C-2123）

我媽常說：「……你的成績好一點，你不怕沒有東西可以讓你選啊！」喔應該說成績好一點，你才有職業選擇權；啊如果你成績不好，你就是被選擇。（A-2159）

參與者原先是為了家人的面子而努力獲取好成績，但逐漸也感受到好成績讓自己有面子。參與者逐漸成長之後，開始注意到周遭成績優異者，留意同儕的成績排名、擅長科目等，以成績來認定「社會地位」。參與者 D 認為，自己曾經考到班級排名的前面，會想辦法維持形象；一旦自己成績落後，會覺得與團體格格不入。參與者 C 因為自己成績落後而辭掉了喜歡的社團，專心學業。在成長的過程中，參與者的成績似乎對於面子有舉足輕重的占比。從最原本是為了替家人爭取面子，到後來逐漸轉變是為了自己的社會地位而保持面子。但也不難理解，好成績等於有面子的價值觀是來自於家人的傳遞，參與者也隨之以此視角審視自身所處的環境，並依成績良莠來論定面子程度，而此時的面子，也象徵自己的社會地位。

隨之伴隨而來的還有很多好處，對，這已經不是，不是什麼利益關係了，這是純粹是面子問題，真的會衍生出到這個，因為你嚐到甜頭了，到後面就覺得你要維持住這個形象，偶像包袱。（D-1067）

我覺得周遭就是都是很會念書的人啊！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是，你的成績如果不是跟他們都差不多那樣的程度的話，我反而會覺得自己有點格格不入！所以我會把我自己的成績都 keep 在那個程度上面。（A-1170）

面子從競爭輸贏，到與同儕之間的比較。例如 A 認為自己沒有要跟別人比，是他人要跟自己比；且當他人努力，但考試出來的成績卻沒有比自己好，自己相對會感到有面子。這種不勞而獲感事實上就是一種比較，來自於比他人同儕更多的優越與自豪，包括不用耗費太多心力，卻可以擁有好成績；甚至因為自己成績好，其他人來請教自己。

我跟表妹唸書都各差一屆，然後我沒事都在讀書，所以成績不會差到哪裡去，也是每年成績最好的那個。所以她們有什麼事情都會來問我，我就會覺得自己很棒很棒！（C-1049）

我那時候（成績）就維持得很好，就那時候真的是純粹不服輸，不服輸到包含我國小、國中的暑假作業、寒假作業，我都逼自己一定要在一天內全部寫完。（D-1226）

參與者進入求學階段後，其生活開始以學校為重心，而參與者的成績是代表家人的面子，遂參與者傳承了這樣的價值觀，並依此來論定自己在團體中的地位。接著，進入大專校院的新環境中，面子持續依著傳承的價值觀而加被強化，參與者開始比較，不但希望在團體中保有一定的成績以獲得面子，更希望在同儕中有相對的優越與自豪感，以獲得更多的面子。

2. 面子建立期：面子是演繹他人眼中美好的自己

面子是刻意表現出他人眼中想看到的自己，例如 C 認為自己會刻意在親戚面前表現出優秀的樣子，以屏除對方認為自己嬌生慣養的負向標籤。也會刻意地在他人面前表示「現在這樣的自己，就是真實的自己」。參與者認為自己若能表現出他人眼中所謂良好的樣子，就是有面子。面子也因為關係程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現方式，例如若父母用參與者的身材來開玩笑，參與者就會立刻覺得有失顏面而反擊；但在外人面前，即便覺得不喜歡他人談論自己的身材，也不會把沒面子的感受表現出來，反而會顧及現場和諧，輕鬆接受的帶過。由此可知，當參與者在外人面前感受到失面子，會為了保持場面的和諧而掩飾自己的感覺。

面子有點抽象，嗯就是有時候，你會希望那個人他看到你是一什麼樣。但是他今天卻跟你說不一樣的話，然後你會想說：「哦，我就是這樣啊！我沒有變成那樣！」妳為了要控顧著自己的顏面，而說出這個話。（C-1026）

我現在變胖了，這時候我就有一點點很 care，當然是看場合啦。如果是我爸媽跟我開玩笑，我就覺得很不爽，我會毫不猶豫地回擊。因為他們明明知道我很在意，我好歹也是你們生的，怎麼不給我面子？可是我同事跟我開玩笑，我會說：「對，我就胖啊！」（B-1038）

另一方面，畢業後有「穩定的工作」也是有面子的代表，雖然有些參與者可能並不盡然對自己的科系有興趣，但也因為家人的偏好而投入就讀，參與者獲得家人的認可，也逐漸認可自己的選擇。甚至參與者 C 形容這就像得到全天下一般。除了價值觀的代間傳遞，也不難看出傳統文化與價值觀對面子的影響，包括女生最重要的是有穩定工作，這樣代表很好，有面子。截至大專校院中期，參與者逐漸熟悉環境，對於面子的詮釋仍脫離不了盡力演繹他人眼中的美好自我。

要念○○（學校）有跟爸媽說，他們很訝異為什麼我要唸這學科？但他們說：「哦這科其實工作還不錯、還蠻穩定的！」我就覺得「喔我得到認可了！」很好！我好像得到全天下一樣！我也偷偷問小一屆的表妹。呵呵，就會覺得我唸這科，就會覺得「啊我自己唸得很棒！」（C-1048）

事出意料！就是我大考成績不夠上○○（學校）最頂尖的英文資優班，我爸就生氣了！他說：「妳去念○○（學校），○○（學校）至少可以讓你出來有吃穿、而且是國立！」我說：「我不要去念女生那麼多的學校，也沒有興趣！……」（B-1080）

個人在所就讀的學校代表自己的身分，是面子的指標之一。若自己念的學校排名位置在比較前面，會有相對的優越感。參與者 B 提及自己的學校不算優秀，臺、成、清、交等頂尖大學則是相對傑出的學校。參與者 C 則認為表妹讀的是私立學校，自己就讀國立學校，相對比較優秀。由此可知，參與者是感到有面子，與所就讀學校的名聲、排名等有關，而多也基於世俗社會眼光的比較結果，例如頂尖大學、國立等，參與者認為自己成功地獲得了他人的認可。

我媽跟我說我小時候就是一個愛面子的小孩，長大之後更愛面子。因為長大就是有一些比較級的狀況。像我爸爸是老師，所以老師的小孩子相對都要優秀，那相對來講○○（學校）不是一個優秀的地方，應該是說比起其他的學校，臺清交成政啊！（B-1004）

因為人家都會問媽媽嘛，「妳女兒考哪間學校？」「喔，○○（學校）！」喔，大家就會大拇指伸出來！感覺好像在這科系裡面，○○（學校）是最 TOP、最頂端的，畢竟這是國立的。（D-1135）

3. 面子維護期：從「爭取面子」轉移到「不失面子」

參與者 D 提到代表學校比賽得獎，相對於同儕會有一些特殊待遇和權利，例如請公假、不用午睡、獎學金等，這些福利會讓自己覺得很有面子、自尊提升。師長在公開場合的褒貶態度，會直接讓參與者感受到有面子或失面子。參與者也提到學校老師在同儕面前誇讚自己的時候，也讓同儕對自己正向的觀感，帶來更多欽羨。由此可見，得失面子已經從成績評比逐漸擴大到其他的競賽成果、特殊權利及口頭誇讚等。

我跟著合唱團去比賽，有得全國第一、第二這樣子。回來就有享受到不一樣的待遇，像是可以請公假去練唱、然後不用睡午覺。啊後面福利更多啊，學校會 support 一些吃的、喝的、用的，或者是獎金之類的。然後自尊心上來，就覺得自己很驕傲，就覺得面子掛得住。（D-1063）

我在學校的時候都保持在前三，所以我就是會刻意去看那個成績單，「啊這是誰掉到哪裡，誰又往前」什麼的哦，也就會想說：「我會去看別人的，那別人會不會來看我的？」所以這會影響到唸書的一個態度，就會一直唸。（C-1057）

大專校院初期，參與者也有面臨是否放棄的過程，參與者 B 發現自己一旦沒有辦法獲得好成績，甚至可能是全班倒數時，會萌生不想讀的意念，但礙於面子仍會繼續堅持，即便成績不好也要繼續留在學校裡。參與者 C 坦言，看到同學休學，表面上同理，內心多少產生批判，認為同學應該要堅持完成學業。由此可見，在畢業之前，參與者雖然遇見不少挫折或懷疑，但礙於這種中途離開可能面臨無校可讀、甚至無法獲得穩定工作等，導致一連串盡失顏面的後果，因此堅持到畢業。

我發現自己沒辦法考到全班最高、還可能是全班倒數，我就不想唸了，我很生氣。因為我覺得我唸了跟沒有唸，不是一樣嗎？乾脆不要唸了，考多少是多少，隨便啦！這就是我的面子，寧願人家說：「啊，他就這樣啊！翹課成績爛啊！」（B-1208）

但至大專校院中期，參與者似乎對於成績已經有了一些鬆動，認為大家的程度都很優秀，自己只要可以畢業就好，若成績因為不及格而延畢，才會覺得沒面子。

到○○（學校）之後，我唸的就是大家的第一志願，大家都會唸書的那一種。我的成績掉到班上的15、20名，可是我就覺得我就畢業就好啊！就是不會再在意那些東西，我有過，我畢業就好了啊！（C-1055）

參與者的焦點從「爭取面子」轉移到「不要失面子」。對於成績的觀點，也從爭取好成績到不要被當。此也延伸出「落後」的概念，參與者B提及，自己因為休學一陣子，後來復學之後降級，跟著學妹一起上課，感到有失顏面，因此抗拒。參與者隨著年齡的增長，以及對於學習環境的熟悉與適應，面子的內涵已經由競爭輸贏的向上比較，轉移到與同儕一樣就好的向下比較。換句話說，只要是還能在同溫層，或者能跟上一般的進度，都覺得可以接受。大專校院中期，參與者能掌握和熟悉環境，對面子的彈性解讀與包容也隨之擴大許多。

雖然休學只有短短不到三個月時間，我就反悔，可是三個月還不到一個學期，所以我就只能降級。我沒有辦法說我跟學妹一起上課，他們有一段時間還是要叫我「學姐」，如果他們不叫我「學姐」，我會覺得很怪。我居然去唸了學妹的班，是什麼何等事情？我死都不肯進學校。我就覺得「哦我為什麼要跟學妹同班？為什麼不讓我回去原本班級？」（B-1190）

4. 面子重建期：面子又聚焦回社會比較的結果

隨著不同的生涯階段，參與者從大專校院畢業進入職場初期，看待面子的視角出現轉移，是否有面子與薪水、財富等具密切關係。就如同參與者D談到，必須要有某一方面的基礎，例如財富夠多，才代表有面子，若什麼都沒有，也不用談面子。可見，當參與者進入新的環境之後，又立刻以外在客觀的競爭比較條件來解讀面子議題。

面子有很多個啊，有的是社交方面的面子，也有是工作方面的面子，也有欸……你要錢很多啦，錢多到就是隨便揮霍都ok，你開心就好。如果說當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有時候面子丟掉無所謂。（D-1263）

即便參與者已在就業中，與同儕相聚時仍會對於就職服務單位進行比較，例如有些同學可以在「知名大醫院」工作，而自己卻在某一家「診所」服務，也會覺得沒有面子，參與者C甚至認為自己很丟臉，而遠離在名氣大機構工作的同學。相較於在學校，這種比較顯得隱晦，也多半是參與者自己內心的衝突，自己心裡的感觸。新興職場就業初期，與過去同儕聚會就成了面子展現的重要場合，發現大家都有好的、正當的工作，只有自己工作尚未穩定，也會感到沒面子。此外，進入職場不熟悉的環境，參與者相對顯得焦慮，面子議題就如同剛進入大專校院時期，聚焦回社會比較的結果。

我是連推甄都是要○○（醫院），而且覺得我明明是可以頂著○○（醫院）光圈的人，為什麼變成沒辦法去成？以後我跟我同班同學吃飯，大家都「我在榮總工作」、「我在成大」、「我在台大」，我卻「在某某診所」！瞬間我所有的計畫目標都是完全……有點……完全……已經退出我的人生以外了。我瞬間失去了方向！就有點自暴自棄。（C-1078）

面子嗎？好的一個社經地位吧！例如我們同學出去聚會或幹嘛的，若是我的朋友各自都有一個正當職業、都知道自己在幹嘛，而且有固定的收入，我卻沒有工作，我會覺得我沒有面子。因為我不知道我要幹嘛。（A-1279）

(二) 面子與自我價值後效的相互機制

1. 面子是在陌生環境中比較出來的自我價值

參與者進入學校環境後，不約而同地發現學業成績是被社會認可的重要項目。學業表現好，老師會讚賞、同學會親近，或自己就讀的是排名較高的學校，都是面子的重要向度。學業表現帶來學校（社會）給予的評價，進而影響自我價值的高低，亦即參與者努力獲得好成績，以被他人讚揚、肯定來提升自我價值。例如參與者 C 選擇大專就讀，是想讓周圍的重要他人覺得自己是傑出的，接著大專畢業後的繼續升學，也選擇社會大眾所認為的第一志願，希望他人對自己讚嘆！學業表現和就讀學校的名次是自我價值的來源。

因為從一年級到五年級，老師都會說：「學校這屆有多少人考上○○。」然後同儕都會覺得說：「我們要唸上第一志願！」學校這邊也是蠻多人都唸○○，所以應該是耳濡目染，就會覺得「哦可能唸○○比較不會丟臉吧！」覺得這樣會比較好看！（C-1007）

……也不是說歧視別人啦，但你就會覺得說你的圈子就是很會唸書的！所以稍微會，我覺得啦，稍微會有一點優越感！就是在他們不會唸書的人面前會稍微有一點優越感，因為你就是在專業上、在課堂上發揮得比他們好！會讓我自己更有自信！（A-1160）

參與者表示對學業表現會設定一個標準，不但自我要求，也同時擔心他人會超越自己，故持續督促著自己努力念書。即便是所選的科系不適合自己，或對未來的生涯迷惘時，也不曾思考轉換其他領域，而是告訴自己，硬撐也要撐過去！以維持自己就讀某科系與學校的榮譽事蹟。是以，學業的表現之所以關鍵性地左右參與者的自我價值，在於學業表現好可以創造出在同儕中較高的社會地位與價值。

就算不是跟同儕，我自己會有一點壓力，說這個分數也不能往後啊！……排名也要好看一點，所以就會督促自己要努力唸書……（A-2067）

在翹課的時候，我通常寧願關在黑嘛嘛的住處，不想面對陽光、也不想面對現實，什麼都不做。但其實在心中我並沒有放過自己，只是一邊自己後悔翹課的心、一邊不想去面對事實。（B-2061）

在學習環境中以成績良莠作為指標，依此論定有、無面子的狀況，其實在畢業至職場初期也明顯感受到。當參與者剛進入職場的陌生環境，也會以賺的薪水、服務公司的規模等具體的外在條件來衡量有、無面子。可見，無論是求學或職場，面子在陌生或尚未熟悉的環境中，都是脈絡中比較出來的自我價值。

2. 面子的標準開始鬆動並對自我價值後效的影響降低

當參與者對於學校的學習環境與氛圍逐漸熟悉，即畢業之前，對於面子的想法已有所改變。例如，學業難度逐漸增加的狀況下，參與者改變了自己內心對於有無面子的認定標準，也就是他們不再只是追求好的成績，而是以能否準時畢業作為有無面子的依據。

因為，因為我們都知道老師出題都很難……所以我們那時候著重在分數有過就好了，那個成績高低都是浮雲，有過就好……成績的高低……跟面子問題，真的不會在乎了……就是那時候已經不是說面子問題或是成績高低的問題，而是你要如何去過關……因為如果你被當，會影響到後面的實習，影響到實習就會延畢，……這個延畢才會提到面子問題。（D-1181）

其實我心裡是很想把書唸好的！我有一科被當三次，即使老師一再一再地當我，我還是把它修到過為止，第三次就考 80 分過關！這就是我與其他休學生的差別。當然也是有那種很天才的學生，他一次就過。只是他比不過我中間那一年出去鬼混，後來又回頭的那種反差感。那種成就感帶給我無比的面子。（B-1231）

參與者逐漸展露了主體的想法與視角，深度思考成績對自己的意義；甚至決定維持基本的標準（不要被當），更聚焦於如何使用學習的知識來幫助他人或做有意義的事，因此之後對面子的在意程度下降許多。另外，當家人或師長對自己的課業分數不再那麼關注後，也漸漸放下對成績的要求，對面子的在意程度也就下降。如參與者 D 表示，學習焦點放在專業知識的增與培養更多的思考能力，也因而理解面子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對自己交代。至此，自我逐漸走出了面子的框架，也放下了比較的議題。

我的面子問題有一部分是因為家庭壓力跟師長的壓力。但學校這邊沒有家人、老師的成績壓力，你就會……放鬆一點，做自己。（D-1150）

我覺得○○（學校）沒有像國中就是著重在成績，而是要有一些批判性思考之類的，希望你變成像一個人，而不是像之前那種只會讀書的機器……所以漸漸那個面子問題就有點放低了，你就會著重在要如何去幫助人、去學習，你就不會去 care 說：「我成績輸了，我面子掛不住，我沒辦法跟誰誰誰交代，我沒法對我自己交代」幹嘛之類的。（D-1156）

雖然參與者的面子議題仍存在，但在逐漸熟悉的環境下，參與者漸漸地看見面子帶給自己的限制，進而調整自己的認知，不把時間與精力放在爭輸贏，也不再把面子當成一種束縛。當參與者不在乎成績時，不只對自我價值後效的影響降低，也會不在意他人的眼光或比較。可見，面子隨著心境與想法而調整，即便是對於學業表現之同一件事情，隨著年齡增長而更具彈性。

我到了○○（大學）之後才有比較好一點，我覺得主要是因為大家都很優秀，所以就沒什麼好比的，變成是大家都求把書讀好、成績上來、技術考過之類的，所以那個面子問題就沒放那麼重了！（D-1016）

3. 拋下面子而從內在期望強化自我價值後效

身邊的重要他人影響甚重，安全與支持的環境可能讓人勇敢放下面子，例如當參與者表現不如預期，師長仍不放棄自己，身邊的支持系統能給予更多空間，參與者就不會感到失去面子的問題。參與者 D 就認為，自己在一個全新的學習領域裡，本來就會重新開始，只要符合基本水準就可以。因此，友善與支持的環境讓參與者更能感受安全，體驗到自己的獨特價值，進而也會以更寬容的態度面對自己。大專校院後期，明顯地看出參與者自我意識逐漸成形，也更能面對自己內在所嚮往。

面子現在對我來講已經不是那麼重要，因為……學校老師真的是蠻蠻……肯給我機會的。因為我不管再怎麼樣蹺課、的確唸了很久……他們不會放棄我，他們真的沒有放棄我！這就是重點。（B-1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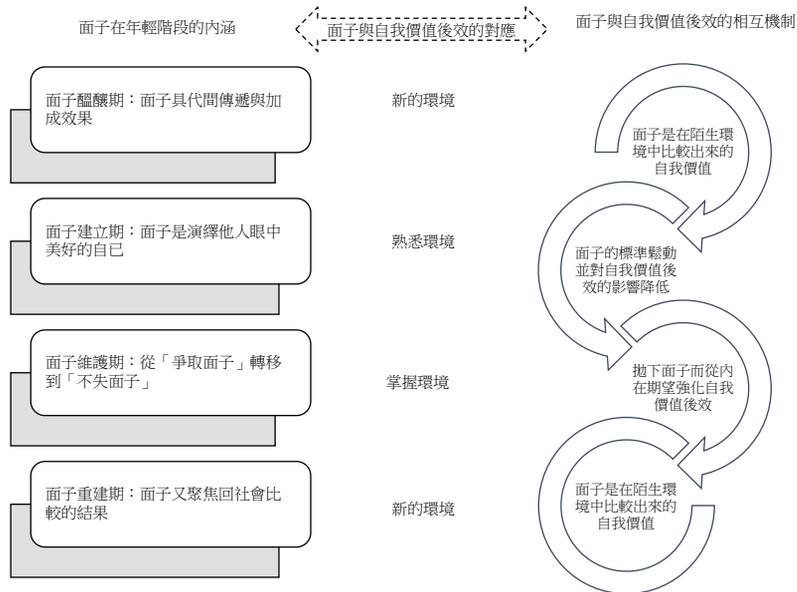
參與者 D 更認為，如果要堅持面子的話，可能很多事情無法完成；若能拋下面子，更能看清自己想要的。參與者慢慢體悟到面子對人的框限，其實聚焦回把自己認為重要的事情做好，不需要把面子看得這麼重。參與者 C 認為，就是去完成自己心理期望的樣子，這會督促自己前進，往目標努力。也呼應參與者 B 提到，自己某個科目被當了三次，但仍然堅持不懈，最後成績通過，會帶來無比的成就與面子；也不諱言自己比起很多人一次就通過，也多很寶貴的經驗。不難發現，參與者深刻感受到面子對自己發展上的限制，在人生的過程裡很可能因為礙於面子而無法突破某些關卡。參與者逐漸看見自我的信心、韌性與優勢，把焦點回到自己真正的期望與目標，也因此更有動力。可惜的是，在進入一個新的職場環境時，參與者不免又陷入薪水、機構名氣等外在比較的思維中，依此評斷自己有沒有面子。

如果說你還持續要這個面子的話，你很多事情做不了！就有的時候不要那個面子，反而活得更快樂。因為從某觀點來講，它算是一個項圈把你束縛住。（D-1262）

在我升學或是唸書時，它可能有點像是一個目標吧，你要完成你心理期待成為那個樣子！然後成為那樣的時候，就會覺得很開心，就是符合自己的期待；那如果你沒有期望成為心裡的样子，就會，嗯，很失望，對，呵呵呵，所以好像會去督促你，往那個目標去前進。（C-2131）

整體研究結果，年輕人的面子形成有四個階段，第一是面子醞釀期，剛開始在新的環境中，面子具代間傳遞和加成效果，面子的發展是來自於家人的期望與價值觀，參與者僅是獲取好成績供家人宣揚，但逐漸地也感受到好成績也變成自己在同儕中社會地位的象徵。第二是逐漸熟悉環境的面子建立期，特別針對外人時，面子代表著參與者演繹出他人眼中美好的自己。第三是更能掌握環境的面子維護期，開始鬆動面子的標準，從「爭取面子」轉移到「不失面子」。第四是面子重建期，開始重新面對新的環境，面子又聚焦回社會比較的結果。面子與自我價值後效的相互機制有三個面向，剛開始面子是在陌生環境中比較出來的自我價值，例如參與者透過學業表現感受到自己的社會地位，進而增進自我價值。接著，參與者的面子標準開始鬆動，並對自我價值後效的影響降低，此時主體思考更甚於有無面子的情況。最後，參與者拋下面子而從內在期望強化自我價值後效。然而，參與者進入職場的新環境之後，面子又回到了以社會比較來代表自我價值。研究結果如圖 1。

圖 1
面子與自我價值後效的對應



討論

(一) 面子來自於當時內在自我協調的結果

本研究結果有兩項突破性的發現。首先，參與者對面子的感知多半承襲了家人對於「有面子」的價值觀，也會依此價值觀來審視自己的社會地位，並且在自己的面子上繼續堆疊加重該價值觀。根據本土心理學家黃光國（1988），面子是為了希望兼具重要家人的共同體面。但本研究結果發現，

學業表現是自我價值的重要來源；而初始的面子不是為了自己與家人的共同體面，而是單純的想成全父母的體面，讓父母得以有面子，也就是面子的開始是達成家人的目標與期望。整體來說，面子具有代間傳遞的特性，參與者（承接者）會依此眼光來審視自我價值，持續維持好的成績，逐漸從讓父母有面子，轉換為成就自己的面子。顏姿吟與連廷嘉（2020）研究生涯代間傳遞，發現家人會重現並傳遞他們從原生家庭習得的信念、價值觀、與行為模式。這代間傳遞是家人認同社會環境賦予某一職業的意義後，透過家庭凝聚力、不斷且迂迴地遞送正面訊息、形塑自家的獨特意涵等環節，去勉勵子女認真學習，以達成代間傳遞。生涯代間傳遞包含社會與家庭等環境、以及子女的課業努力學習等要素，與本研究發現，面子具有代間傳遞的特性不謀而合。可見，面子可能不是我們從小就擁有或知道去維護的，而是傳承自父母等重要他人而來。至於西方學者提及，面子是外在自我形象的維持（Goffman, 1959），本研究認為這並非人們原本對於面子內涵的起始點，參與者自我形象良莠的觀點，是來自於父母親或社會比較，而所謂的「自我形象」就是努力依照社會的標準而去維持，如同本研究結果之「面子建立期：面子是演繹他人眼中美好的自己」。本研究提出，面子中所談的「自我」多半是指他人眼中的自己，而「形象」則是依照外在世俗標準努力維持來的。

面子的內涵有東西方文化之差異。例如 Brown 與 Levinson（1987）提及，期待擁有自身的行動與自主決定，不受到干涉或阻礙的消極性面子。在本研究中並無特別發現，本研究僅指出在面子維護期，從「爭取面子」轉移到「不失面子」，本研究所談的不失面子指的是跟大家齊頭一樣，不要落後於同儕，例如可以準時畢業等，故未出現為了維護自己而衍生的消極性面子，也無 Oetzel 等人（2001）所強調，個人為了維持自己可信任的形象，會表達自己的想法、情緒等，甚至適時捍衛與反擊。從此不難看出偏個人主義的西方文化，在個人面子的維護上具有較清楚的界限，會為了捍衛個人自主性而維護消極性的面子。本研究發現，面子的意義多半是在社會中與他人比較所產生的，偏集體主義的東方文化，個人的價值鑲嵌於團體社群脈絡中凸顯。本研究進一步推測，華人社會在表達失面子上，可能較為隱晦或壓抑；甚至努力維持與大家一樣的水準，避免使自己處於失面子的窘境。故本研究中的不失面子，仍逃離不了與同儕間的比較，只是從爭取好成績的向上比較，到不失面子的向下比較。

本研究另一項突破性的發現在於，參與者對於周遭環境的掌握程度決定了他們如何詮釋面子。當個人進入一個新環境感到焦慮，容易依父母或者社會大眾的價值觀，作為自己無面子的判斷，例如本研究「面子醞釀期：面子具代間傳遞與加成效果」、「面子重建期：面子又聚焦回社會比較的結果」，前者是剛進入大專校院的時期，以學業表現、就讀學校名聲，作為有無面子的依據；後者是新進入職場，會以自己的薪水、服務單位名氣等，作為有無面子的判斷。然則，當參與者開始掌握與熟悉環境的時候，似乎也相對有安全感，對於有無面子的標準明顯下降，放寬對自己的要求。Arundale（2010）認為面子功夫是溝通者在人際互動關係中進行交流時，表現出的行為反應。許詩淇與葉光輝（2019）也強調面子是影響華人人際互動運行的「潛規則」。

以上無論是這些父母的價值觀、世俗的標準等都是參與者對於面子初始的內化，遂依此價值觀繼續審視自己，直到個人感知環境熟悉，才會鬆動面子的標準。這一連串都是個人內在心理機制的運作與溝通。例如參與者可能認為自己畢業後沒有工作，很沒面子；但就某程度來看也是內在綜合協調的自我觀感，而非來自他人的回饋或反應。總體來說，面子的形成與內涵就是一種人際溝通與行為表現，面子更是一個自我協調的結果。

（二）面子是代間傳遞、社會比較、外在環境掌握度的綜合交織

青少年到年輕時期的生活關注研究，王玉珍（2018）研究指出青少年的生活重心包含了學業、家人、同儕等多面向；陳柏霖等人（2023）也指出大學生生活中，學業、家庭、未來規劃及人際等是幾項重要的大壓力源。從青少年到年輕時期，個體的生活重要議題，包含學業、家庭、人際等。本研究有相似結果，本研究進一步闡述，面子議題似乎始於求學期間的學業成績表現居多，可能來自父母自己對於學業成績表現價值觀的代間傳遞，子女繼續承襲著父母把學業表現視為面子的觀點，甚至子女長大之後將「面子的有或無」延宕到服務職場上的比較。

從社會與心理的觀點來看，近期的研究顯示，中學生的同儕關係透過學習動機與學習投入，直接顯著地正向影響學業表現（Shao et al., 2024），可見學業成績表現也部分受到同儕關係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在面子醞釀期中，面子的發展是來自於家人的期望與價值觀，逐漸地也認為好成績在同儕中社會地位的象徵。故學業表現、同儕關係及面子三者皆息息相關。到了大學階段，Li 等人（2023）透過系統分析 2012 年到 2022 年之間的 43 篇關於心理資本（psychological capital）對於大學生學業表現影響之研究，結果發現心理資本對於大學生的學業表現佔有重要的角色，包括自尊、動機、感激及社會支持等。陳坤虎等人（2005）研究認為，大學階段個體漸漸不再那麼重視外在客觀的標籤或評價，轉而重視自己的生涯目標。從中學生到大學生階段，個體逐漸從外在標準轉移回個人內在，從心理狀態影響外在表現，進而影響面子。此時的面子內涵又有何不同？本研究結果的第三階段是「面子建立期：面子是演繹他人眼中美好的自己」，第四階段是「面子重建期：面子又聚焦回社會比較的結果」，即便是大專校院或者初出社會階段，面子之下的自我認同參雜著社會比較的眼光，包括自己的學校名聲、服務的機構規模聲望等。

當然，也有研究認為這些社會比較能為年輕人帶來正向的動力，例如 Pavlova 等人（2018）探討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s）對於職業不確定性的影響，其發現「向上比較」可以預測會有較高的目標投入，因此社會比較在生涯不確定性中被視為自我進步（self-improvement）的角色。顯見，社會比較帶來了面子議題，進一步提升了個人進步的動力。本研究補充另一個「來回」的視角，當個體能確切掌握外在環境，感受到較多的安全感，就能超越社會比較對於面子的框架，勇敢地拋下面子，而從內在期望強化自我價值後效，個體開始掙脫世俗價值而看見自己的渴望。楊順翔與陳坤虎（2023）也提到，當個體不斷地困在重複、且被動的探索中，感到擔心害怕或無望時，只要能以積極因應的態度去行動，也為自己生涯的一大助力。只是好景不常，在第四階段進入職場後，面對新的環境下，缺乏安全感之下，個體的面子議題又再度陷入社會比較的系統中。在此也說明了，人要突破社會大眾所認定的傳統價值與社會比較，實不容易。當然具有文化的因素，黃光國（2009）認為，儒家社會中的成就目標分為「縱向傑出」、「個人目標」及「橫向傑出」等，其中「縱向傑出」是指儒家文化中社會賦予高度價值的生活目標，儒家社會鼓勵大部分的人兒童追求「縱向傑出」的成就目標。本研究也發現縱向傑出的強大影響力會根深於個人對自己有沒有面子的感知，傳統價值與個人目標是一個糾結掙扎的拉扯，而社會賦予的高度價值之目標仍略勝一籌。

（三）影響面子與自我價值後效的關鍵因素

Ting-Toomey（2005）認為面子有自我面子、他人面子及相互面子等三種，但本研究並無出現關注雙方形象的「相互面子」，頂多是大專校院前期參與者為了提供「他人（父母）面子」而努力獲得好成績。可能是因為本參與者屬於剛出社會的職場初期，社交技巧、人際溝通或交換利益等人際互動模式較為生澀，因此在相互面子的部分較少。當然也無 Hwang（1987）的「人情與面子理論模型」當中，請託者依照與資源支配者之間的關係程度，來提供相對應的協助。如果面子的議題多聚焦於自我的心境轉化，那對於自我價值與後續效應的影響又如何？

從文獻上看，面子與自我價值後效像具有相互性。Crocker 與 Wolfe（2001）認為當我們越在乎這件事情，它對我們的影響越大，此事件帶來成功經驗，自然願意更加投入，但若是失敗的經驗，可能我們會變得意興闌珊，甚至不在乎面子問題。然而本研究發現這並非是一個扁平的化約流程，而是一個動態且消長的機制。具體來說，面子與自我價值後效的關係，不僅受到成功或失敗經驗的影響，也受到環境熟悉度、主體內在期望的影響。當環境較為陌生的時候，參與者依世俗價值觀來認定自己是否有面子，如本研究結果「面子是在陌生環境中比較出來的自我價值」。然而，當參與者對環境較為熟悉，面子的標準鬆動的時候，自我價值後效的影響亦隨之降低。當環境變得比較能掌握且相對安全的時候，參與者開始思考面子對自己的意義，於是乎可以拋下面子，去追求有意義的目標，此時自我價值後效不再僅來自於成功或失敗的經驗，而是來自於是否正視與追求自己內在的期望。是故，面子的標準鬆動是關鍵，參與者不再以比較來認定自我價值，而是回歸主體的期望與實踐。回應本文破題，「怕沒面子」？「怎麼樣都不能失面子」？依本研究結果，人的確在陌生的環境中會「怕沒面子」，而這原始面子的標準是由外而內化，但是「面子的標準會鬆動」，當個人逐漸能對環境掌握，就會體悟到，緊緊抓住的面子可能對自己是一種束縛，遂勇敢「拋下面子」去追求內在的期望，依此來審視自我價值與後續效應。可惜的是，這循序漸進的歷程，也可能因為新興的環境，個人又回到「怎麼樣都不能失面子」的社會比較裡。

面子的形成一定是線性的發展嗎？階段間可能是循環或重疊的嗎？事實上，本研究間接發現了影響面子的幾個關鍵元素，包括父母價值觀、個體所處的環境氛圍、服務單位與職位等。如果這些關鍵元素有所改變，面子的發展也可能改變。例如，父母親的教育觀點就是適性發展而不太在乎成績表現，孩童時期的面子發展，可能就有所不同。再者，本研究參與者為大專校院畢業之女性年輕族群，可能對未獲得大學學位、男性年輕族群，或者已進入職場多年的年輕族群，在工作表現與面子之間的體悟也會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認為面子的形成內涵也需考量個體的所處的家庭背景、學習氛圍，以及職場工作經驗等。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本研究結果「面子建立期：面子是演繹他人眼中美好的自己」中提及，參與者在家人面前，會因為家人的某些行為讓自己有失顏面，進而直接表達與反擊；但在外人面前，即便覺得有失顏面，但怕表達出來會破壞場面和諧，因此隱忍。此結果與吳翠松等人（2015）的論點剛好相反，其認為若關係越疏離，越不會考量面子的重要性。本研究發現，即便覺得當下的場合讓自己很沒面子，但個人可能更擔心表達出來會讓場面難堪。可見，有無面子是一個層面，但是否選擇將「沒面子」這件事表達出來，又有其他層面的考量。而且，人們傾向在夠安全的環境或家人面前，表達自己感到沒面子，可見面子與環境脈絡息息相關。

建議與限制

（一）面子議題應該考量個人身處的環境

本研究結果發現，當個人面對陌生新環境容易有面子的焦慮問題，而此焦慮多來自於比較。然而，面子的內涵隨階段而不同，特別當個人處於較熟悉的環境時，面子的標準會鬆動。因此建議，增加個人對環境的掌握度，並且加強探索個人的內在期望，於是較能擺脫面子的束縛，進而讓主體更能以意義性的角度增進自我價值後效，而非就世俗社會價值標準來決定自我價值後效。

（二）澄清內在期望並發揮勇氣

當個體能確認自己的內在期望，外在世俗所定義的好、壞標準就會有所鬆動，進而勇於拋下面子議題，追自己的目標。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可以協助個體覺察影響感知面子的關鍵因素，澄清內在興趣與目標，掌握外在環境，於是個體可以產生安全感，進而發揮勇氣，從內在期望強化自我價值後效，掙脫面子對於自己的限制。

（三）探討不同年齡階段的面子形成

本研究發現不同的年齡階段，對於面子的詮釋有所不同，面子關乎於在該階段的團體中，個人對自己表現或所處位階的評價，而這都與該階段的生涯發展任務等有關，例如本參與者在進入職場時，容易以財富、就業機構的名氣來衡量有、無面子。因此建議未來可以搭配不同年齡的生涯發展階段、特質、生涯任務等進一步與面子連結探索，定能剖析面子在個人、人際關係及環境中的運作。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過程有幾項限制，首先，研究參與者的取樣方面，本研究一開始以公開招募方式邀請，或許受到面子因素的影響，找不到願意參與之受訪者，故後來採便利取樣，透過在同一城市不同大專校院之相識輔導人員邀請曾有面子感受經驗的大專校院學生，但最終僅募得四位女性參與者，同質性高。雖然透過深度訪談取得豐厚的資料，但也難免因為便利取樣的侷限，而遺漏了男性年輕族群或多元背景的相關資料。第二，實際訪談的執行方面，研究大綱雖聚焦於生活、學業、人際與生涯發展等多元面向，但實際訪談時，研究參與者多論及學業對面子的影響，當下並未再予以擴展，可能也造成研究結果之學業影響面子的比重偏高。雖然本研究透過深度的分析提出突破性的發現，但此等限制也多少影響了研究結果的周延與完整。

參考文獻

- 王玉珍 (2018) : 〈青少年目的感經驗之探究〉。《教育心理學報》, 49, 437–459。[Wang, Y.-C. (2018). The experience of adolescents' sense of purpose.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9, 437–459.] [https://doi.org/10.6251/BEP.201803_49\(3\).0005](https://doi.org/10.6251/BEP.201803_49(3).0005)
- 王彥舜、許雅茹 (2016) : 〈被擠壓的白衣天使—護理專科學生輔導工作經驗〉。《諮商與輔導》, 371, 43–46。[Wang, Y.-S., & Xu, Y.-R. (2016). Bei jiya de baiyi tianshi: Huli zhuanke xuesheng fudao gongzuo jingyan. *Counseling & Guidance*, 371, 43–46.]
- 吳翠松、羅宜青、陳羅水 (2015) : 〈台灣當代議聘過程之文化與性別意涵分析：一個苗栗客家地區文化展演的觀察〉。《傳播與社會學刊》, 32, 167–208。[Wu, T.-S., Lo, I.-C., & Chen, L.-S. (2015). A cultural and gender implications study of negotiating betrothal money/gift situations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ociety: A cultural performance observation for Hakka people in Miaoli County. *Communication & Society*, 32, 167–208.] [https://doi.org/10.30180/CS.201504_\(32\).0007](https://doi.org/10.30180/CS.201504_(32).0007)
- 林美珠、溫錦真 (2018) : 〈臺灣心理與諮商敘事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53, 81–116。[Lin, M.-J., & Wen, C.-C. (2018). Review and prospect of narrativ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in Taiwan.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53, 81–116.] <https://doi.org/10.3966/172851862018100053004>
- 林淑君、王麗斐 (2017) : 〈偏鄉青少年完成高中職學業的促進因素研究：以某偏鄉國中畢業生為例〉。《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25 (4), 127–171。[Lin, S.-C., & Wang, L.-F. (2017). Facilitating factors on the completion of high school degrees by adolescents in remote areas: A case study of graduates from a remote junior high school.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25(4), 127–171.] <https://doi.org/10.6151/CERQ.2017.2504.04>
- 侯盈如、謝琇玲、林惠敏 (2021) : 〈面子和關係需求孰重？華人文化下青少年的幸福感前因探討〉。《管理資訊計算》, 10 (1), 50–59。[Hou, Y.-J., Hsieh, H.-L., & Lin, H.-M. (2021). Which need motivation is more important, face or guanxi? A study of the antecedents of adolescents' well-being under the Chinese cultur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omputing*, 10(1), 50–59.] [https://doi.org/10.6285/MIC.202103_10\(1\).0005](https://doi.org/10.6285/MIC.202103_10(1).0005)
- 陳之昭 (1995) : 〈面子心理研究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見楊國樞 (主編), 《中國人的心理》, 頁 155–237。桂冠圖書。[Chen, Z.-Z. (1995). Mianzi xinli yanjiu de lilun fenxi yu shiji yanjiu. In K.-S. Yang (Ed.), *Zhongguoren de xinli* (pp. 155–237). Laureate Book.]
- 陳可心、劉美吟、王靜枝 (2020) : 〈影響失智者面子之因素探討—系統性文獻回顧〉。《護理雜誌》, 67 (2), 75–83。[Chen, K.-X., Liu, M.-Y., & Wang, J.-J. (2020). Factors influencing “face” in people with dementia: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he Journal of Nursing*, 67(2), 75–83.] [https://doi.org/10.6224/JN.202004_67\(2\).10](https://doi.org/10.6224/JN.202004_67(2).10)
- 陳坤虎、雷庚玲、吳英璋 (2005) : 〈不同階段青少年之自我認同內容及危機探索之發展差異〉。《中華心理學刊》, 47, 249–268。[Chen, K.-H., Lay, K.-L., & Wu, Y.-C. (2005). The developmental differences of identity content and exploration among adolescents of different stages. *Chinese*

- Journal of Psychology*, 47, 249–268.] <https://doi.org/10.6129/CJP.2005.4703.04>
- 陳柏霖、蔡亦倫、陳玉樺（2023）：〈「大學生生活壓力量表」之試題衡鑑〉。《測驗學刊》，70，163–192。[Chen, P.-L., Tsai, Y.-L., & Chen, Y.-H. (2023). Evaluation of the life stress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s using the partial credit model. *Psychological Testing*, 70, 163–192.]
- 許詩淇、葉光輝（2019）：〈華人人際及群際關係主題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本土心理學研究》，51，33–88。[Hsu, S.-C., & Yeh, K.-H. (2019). A review of Chinese indigenous research on interpersonal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51, 33–88.] [https://doi.org/10.6254/IPRCS.201906_\(51\).0002](https://doi.org/10.6254/IPRCS.201906_(51).0002)
- 黃光國（1988）：〈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見黃光國（主編），《中國人的權力遊戲》，頁7–55。巨流圖書。[Hwang, K.-K. (1998). Renqing yu mianzi: Zhongguoren de quanli youxi. In K. Hwang (Ed.), *Zhongguoren de quanli youxi* (pp. 7–55). Chuliu Publisher.]
- 黃光國（2009）：《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心理出版社。[Hwang, K.-K. (2009). *Rujia guanxi zhuyi: Zhexue fansi, lilun jiangou yu shizheng yanjiu*. Psychological Publishing.]
- 楊順翔、陳坤虎（2023）：〈邁向成人期生涯決策自我效能、積極因應與生涯召喚之關係—認同探索型態調節效果之探討〉。《教育心理學報》，54，863–890。[Yang, S.-H., & Chen, K.-H. (2023). Relationships among self-efficacy in career decision-making, proactive coping, and one's calling in emerging adulthoo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dentity exploration.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4, 863–890.] [https://doi.org/10.6251/BEP.202306_54\(4\).0005](https://doi.org/10.6251/BEP.202306_54(4).0005)
- 韓貴香（2014）：〈社會比較情境中表現劣者的沒面子感受與情緒：臉面共享成員在場與情境公開性的影響〉。《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41，1–24。[Han, K.-H. (2014). Losing face and emotions in a social comparison situation: The effects of face-sharing member and the openness of situ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41, 1–24.]
- 顏姿吟、連廷嘉（2020）：〈臺灣醫師世家的生涯代間傳遞〉。《教育心理學報》，52，287–310。[Yen, T.-Y., & Lien, T.-C. (2020). Intergenerational career transmission in a Taiwanese medical family.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2, 287–310.] [https://doi.org/10.6251/BEP.202012_52\(2\).0003](https://doi.org/10.6251/BEP.202012_52(2).0003)
- 蘇珊筠、黃光國（2003）：〈退休老人與大學生在生活場域中的關係與面子〉。《中華心理學刊》，45，295–311。[Su, S.-Y., & Hwang, K.-K. (2003). Face and relation in different domains of life: A comparison between senior citizens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45, 295–311.] <https://doi.org/10.6129/CJP.2003.4503.06>
- Arundale, R. B. (2010). Constituting face in conversation: Face, facework, and interactional achievement. *Journal of Pragmatics*, 42(8), 2078–2105. <https://doi.org/10.1016/j.pragma.2009.12.021>
- Brown, P., & Levinson, S. C.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opersmith, S. (1967). *The antecedents of self-esteem*.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 Crocker, J., Brook, A. T., Niiya, Y., & Villacorta, M. (2006). The pursuit of self-esteem: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and self-regul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4(6), 1749–1771.

-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2006.00427.x>
- Crocker, J., & Wolfe, C. T. (2001).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3), 593–623.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08.3.593>
- Deci, E. L., Koestner, R., & Ryan, R. M. (1999).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experiments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extrinsic rewards on intrinsic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6), 627–668.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25.6.627>
- Donohoe, C., Topping, K. J., & Hannah, E. (2021). Mindset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classroom: Interaction with social value of effort and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Educational Psychology in Practice*, 37(3), 235–250. <https://doi.org/10.1080/02667363.2021.1905613>
- Erikson, E. H. (1958). *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W. W. Norton & Company.
- Erikson, E. H. (1963). *Youth: Change and challenge*. Basic Books.
- Erikson, E. H. (1994).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W. W. Norton & Company.
- Fiske, A. P. (1991). *Structures of social life: The four elementary forms of human relations: Communal sharing, authority ranking, equality matching, market pricing*. Free Press.
- Goffman, E. (1956). Embarrass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2(3), 264–271. <https://doi.org/10.1086/222003>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Doubleday.
- Gorghiu, G., Voicu, C. D., & Gorghiu, L. M. (2015).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een-agers' self-image and their preferences for science disciplines contents.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5, 315–320. <https://doi.org/10.1016/j.sbspro.2015.09.090>
- Hofstede, G. (2001).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2nd ed.). SAGE Publications.
- Hwang, A., Francesco, A. M., & Kessler, E. (200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face, feedback and learning processes i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4(1), 72–91. <https://doi.org/10.1177/0022022102239156>
- Hwang, K. (1987).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4), 944–974. <https://doi.org/10.1086/228588>
- King, Y., & Myers, J. T. (1977). *Shame as an incomplete concep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 study of face*. Social Research Center,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awrence, J. S., & Smith, J. L. (2017). Academically contingent self-worth and vulnerability: When approach self-validation goals are more threatening than avoidance self-validation goals. *Self and Identity*, 16(3), 353–372. <https://doi.org/10.1080/15298868.2017.1292183>
- Leppink, E. W., Odlaug, B. L., Lust, K., Christenson, G., & Grant, J. E. (2016). The young and the stressed: Stress, impulse control, and health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204(12), 931–938. <https://doi.org/10.1097/NMD.0000000000000586>
- Li, R., Hassan, N. C., & Saharuddin, N. (2023). Psychological capital related to academic outcome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Behavior Management*,

- 16, 3739–3763. <https://doi.org/10.2147/PRBM.S421549>
- Lieblich, A., Tuval-Mashiach, R., & Zilber, T. (1998). *Narrative research: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SAGE Publications. <https://doi.org/10.4135/9781412985253>
-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SAGE Publications.
- Marcia, J. E. (1966).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ego-identity statu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 551–558. <https://doi.org/10.1037/h0023281>
- Marcia, J. E. (1980). Identity in adolescence. In J. Adelson (Ed.),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pp. 159–187). John Wiley & Sons.
- Marcia, J. E. (1991). Identity and self development. In R. M. Lerner, A. C. Peterson, & J. Brooks-Gunn (Eds.), *Encyclopedia of adolescence* (Vol. 1, pp. 529–533). Garland Publishing.
- McCormick, W. H., Turner, L. A., & Foster, J. D. (2015). A model of perceived parenting, authenticity, contingent self-worth and internalized agg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6, 504–508.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5.06.050>
- Oetzel, J., Garcia A. J., & Ting-Toomey, S. (2008).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face concerns and facework behaviors in perceived conflict situations: A four-culture investig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19(4), 382–403. <https://doi.org/10.1108/10444060810909310>
- Oetzel, J., Ting-Toomey, S., Masumoto, T., Yokochi, Y., Pan, X., Takai, J., & Wilcox, R. (2001). Face and facework in conflict: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China, Germany,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68(3), 235–258. <https://doi.org/10.1080/03637750128061>
- Pavlova, M. K., Lechner, C. M., & Silbereisen, R. K. (2018). Social comparison in coping with occupational uncertainty: Self-improvement, self-enhancement, and the regional contex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6(2), 320–333. <https://doi.org/10.1111/jopy.12317>
- Polkinghorne, D. E. (1995). Narrative configuration in qualitative analysis. In J. A. Hatch & R. Wisniewski (Eds.), *Life history and narrative* (pp. 5–23). The Falmer Press.
- Shao, Y., Kang, S., Lu, Q., Zhang, C., & Li, R. (2024). How peer relationships affect academic achievement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BMC Psychology*, 12(1), Article 278. <https://doi.org/10.1186/s40359-024-01780-z>
- Ting-Toomey, S. (2005). The matrix of face: An updated face-negotiation theory. In W. B. Gudykunst (Ed.), *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p. 71–92). SAGE Publications.
- Tracy, K. (1990). The many faces of faceworks. In H. Giles & W. P. Robinson (Eds.),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pp. 209–226). John Wiley & Sons.
-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J. B., Tynan, R., Galinsky, A. D., & Thompson, L. (2004). Face threat sensitivity in negotiation: Roadblock to agreement and joint ga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94(2), 102–124. <https://doi.org/10.1016/j.obhdp.2004.03.005>

收稿日期：2023 年 10 月 09 日
一稿修訂日期：2023 年 11 月 24 日
二稿修訂日期：2023 年 11 月 28 日
三稿修訂日期：2024 年 03 月 18 日
四稿修訂日期：2024 年 06 月 01 日
五稿修訂日期：2024 年 06 月 18 日
六稿修訂日期：2024 年 06 月 21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4 年 06 月 21 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24, 56(2), 333–356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What Is “Fac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eaning of Young People’s “Face” and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Tzu-Yin Yen¹, Ting-Chia Lien², and Hsiao-Feng Cheng³

Face, known as “mianzi” in mandarin, is a phenomenon that reflects an individual’s image and status in social interactions. The concept self-positioning. It is also influenced by sex, interpersonal differences, cultural values and situations. In Chinese society, where emphasis is placed on collectivism and mutual relationships, face is perceived as “others-oriented” and context-dependent. In this cultural setting, strive to uphold their own face and that of their relatives, carefully considering the face of others in social interactions. Furthermore, face functions as a mechanism for building social reputation, shaping social evaluations, gaining recognition, and fostering positive feelings. Therefore, face is an inner feeling of honor, pride, and pleasure, which are derived from an individual’s perception of respect and appreciation from others. In summary, face serves as an indicator of individuals’ importance in the eyes of others.

The development of face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social culture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al stages, which may have several ramifications for individuals. For instance, teenagers are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how others evaluate them; these individuals often seek praise and recognition to enhance their sense of status. When they perceive a loss of face, their self-esteem decreases accordingly.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shaping self-image, face influences self-esteem.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ents occur in life. When individuals subjectively perceive an event as particularly impactful, their self-worth may fluctuate considerably, a concept referred to as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When individuals prioritize academics,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becomes a key indicator of their self-worth.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enhanced self-esteem after academic success. This, in turn, increases their motivation to invest additional time and effort in achieving further success within the same domain.

During young adulthood,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are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social comparisons, parental nurturing style, and school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of face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an individual’s life events. Events that are perceived as highly impactful tend to exert strong effects and induce robust personal commitment. When In individuals with high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are high for certain contexts, individuals show strong dedication to pursuing face. By contrast, when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are low for other circumstances, face becomes less important and had minimal impact on their actions. The present study highlights the close and continu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e and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Face enhances self-worth; high self-worth encourages commitment and effort, which, in turn, enhance face.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d the experiences of young people in developing the concept of face and analyzed its fundamental properties. In addition, we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e and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to elucidate the

¹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Tainan Junior College of Nursing

²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³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Hsiao-Feng Che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cindy6510@ntnu.edu.tw

significance of face in relation to self-perception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Many aspects of this topic remain unclear. For instance, young people in Taiwan are navigating substantial environmental transitions, such as moving from campus life to the workplace. How they perceive and strive to maintain face in these contexts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which prompted us to conduct the present study. This study included graduates (in their 20s) from ordinary colleges. They were asked to reflect on how face manifests in their lives and what it means to them.

Narrative research and convenience sampling were performed in this stud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counselors from three colleges, four graduates (age: 25–27 years)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in-depth interviews. The participants had considerable experiences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 face and were willing to reflect on and share their perspectives. We determined the environmental context,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subjective feelings, and implicit significance of face in the participants' real lives. Through this approach,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e and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was explored. Su and Hwang (2003) found that college students regard academic performance as the most valued aspect of their lives because it provides them with the greatest face. Leppink et al. (2016) indicated that similar to high school students, college students continue to experience considerable academic pressure.

Interview guidelines for this study were designed to address three key aspects, namely, daily living, learning, and career development. Each participant was interviewed twice, resulting in a total of eight interview transcripts. These transcripts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categorical content method. The four confidence indices proposed by Lincoln and Guba (1985) were adopted as examination standards: Credibility, transferability, dependability, and confirmability.

Our findings were two-fold. We identified four stages of face development and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e and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First, the four stages of face development in young people were as follows: Fermenting, establishing, maintaining, and reconstructing. (1) During the face-fermenting stage, face is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and can be augmented. When young people entered college, their face development was influenced by family expectations and values. They inherited these values and used them to gauge their status among peers. Initially, the participants focused on achieving good grades to meet family expectations; over time, they realized that good grades also offered a high status among peers, fostering a positive cycle: Good grades led to a high status, which brought pride and increased motivation, thereby enhancing face. (2) During the face-establishing stage, face was shaped by how individuals perceived themselves through the eyes of others. As they became more familiar with their environment, they recognized that performing well and earning recognition from others enhanced their face. At this stage, face often symbolized attending a prestigious college or securing a stable job. Even if one's field of study was not aligned with their interests, they remained committed to it to maintain face. Face also manifested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For example, in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parents, the participants would push back if they felt a loss of face. However, in the presence of others, but they would concealed their feelings to maintain harmony. (3) In the face-maintenance stage, the focus shifted from "winning face" to "not losing face." Midway through college, the participants became more adept at managing thei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ed greater flexibility and tolerance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face. The concept of face transitioned from a win-or-lose dynamic to maintaining parity with peers. Moreover, the comparison criteria expanded from academic achievements to other areas, such as competitions, privileges, and public recognition. (4) During the face-reconstructing stage, face reverted to its ties with social comparisons. As the participants transitioned from college to workplace, their perception of face shifted. At this stage, face was largely influenced by the indicators of success, such as salary or wealth. In an unfamiliar workplace environment, the participants' experienced anxiety, with their sense of face becoming more dependent on the outcomes of social comparison.

Seco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e and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has three aspects. (1) Face serves as a measure of self-worth in unfamiliar circumstances. For instance, the participants derived their self-worth from academic performance, which, in turn, enhanced their overall sense of self-esteem. (2) The effect of face on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may decrease when other priorities take precedence. In such situations, the main consideration become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resence of absence of face. (3) Individuals may disregard face altogether and strengthen their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in terms of intrinsic expectations. However, upon entering a new workplace, face regains importance, with social comparison once again becoming a key determinant of self-worth. Discus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are presen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ndings.

Keywords: contingent of self-worth, face, narrative research

